

电影艺术理论文辑之一

史楚金在电影中创造的 列宁形象的人民性

巴切里斯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艺术研究与评论

史光全在电影中创造的 列宁形象的人格性

王海燕 李伟

中国文哲出版社

电影艺术理論文輯之一

史楚金在电影中創造的 列寧形象的人民性

〔苏联〕巴切里斯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1·北京

电影艺术理論文輯之一
史楚金在电影中創造的
列寧形象的人民性
〔苏联〕巴切里斯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合饭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中国財政經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850×1168公厘
印张2·字数：53,000
1961年6月第1版
196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書号：E061·942 印数：1—2,400册
定价：0.31元

編者說明

這是《電影藝術理論文輯》的第一輯。編在這一輯里的是巴切里斯的研究論文《史楚金在電影中創造的列寧形象的人民性》。

巴切里斯在自己的論文中，對杰出的蘇聯人民演員史楚金（1894—1939）在影片《列寧在十月》（1937）和《列寧在一九一八》（1939）中所創造的列寧形象，就形象的人民性這個方面，作了研究。在論文中，作者提出了許多具有原則意義的論點。作者指出，史楚金所創造的列寧形象的人民性不是其他，而首先在於形象所要表达的，是“那正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群眾的領導者的人民性”。從這一基本觀察出發，作者論證了史楚金的列寧形象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充分體現了列寧自己所說的“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這一主題。作者在論文中，通過對史楚金所創造的列寧形象的具體分析，論證了伟大與朴素、崇高與亲切这样一些美学范畴在社会主义艺术中，特別在創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工作中的发展。

本文譯自蘇聯科學院藝術史研究所電影史組編輯的《電影藝術問題》1955年度年刊。

編者

1961年5月

史楚金在电影中創造的 列寧形象的人民性。

T·巴切里斯

苏联共产党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的形象，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时代首次通过最有群众性的艺术——电影艺术的手段体现了出来。这一事实有它自己一定的历史规律。

三十年代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設全民高涨的年代。列宁主义的思想变成了现实。很自然，胜利了的人民渴望在艺术作品中看到这一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过程，看到我們国家缔造者的形象。

这时已創造了不少以革命和国内战争为主题的电影艺术作品，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了列宁的主题，都间接地反映了列宁的形象。在其中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如《夏伯阳》、《波罗的海代表》、《我們来自喀琅施塔得》中，领袖的形象虽然是折射地表现出来的，但是却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无论在表现苏联人民和伊里奇的关系方面，或在表现列宁事业与其伟大的思想方面。直到对革命历史的主题进行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以

后，苏联的艺术对于完成最重要的任务——直接通过演员的动作来体现列宁形象的任务——才在政治上和艺术上臻于成熟。

如果整整一代的苏联演员在创造共产党员——列宁主义者形象方面还没有积累起丰富的创作经验，还不能深入了解列宁的思想，体会和解释社会主义祖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从政治上去思考和分析最复杂的国家问题，那么任何一个天才的演员也是不能胜任这项任务的。

1936年春，根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党中央一贯地指导着苏联艺术家注意当代的主要任务），宣布了为迎接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而征集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艺术作品的条例。这些条例直接规定必须显示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活动。

要想用艺术创造的手法全面地揭示出列宁的形象，单靠一个艺术家的努力和才能是不可能的，不管这位艺术家的造诣是多么精湛。个别作品的成功永远是在不同程度上以我们全部艺术和文学所积累的正确经验为基础的。电影事业的成就，还要依靠艺术家——演员、剧作家、导演、摄影师及其他人的集体劳动。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指出史楚金的特殊功勋。

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出现在银幕上已经很多年了，但直到今天这些影片还具有重大的意义。

史楚金演技的力量何在？他的演技的“秘诀”又在哪里？是什么保证了史楚金所创造的形象的不可磨灭的成就？最后，这位演员又给艺术史带来了什么真正新的东西？他的经验具有什么意义？

史楚金达到了只有真正的天才艺术家才能达到的成就，他

令人信服地創造了列寧的形象。這是必須確認的第一點。史楚金具體地表現了列寧在我國革命史上一些轉折關頭中的活動，再現了列寧的確切不移而又卓越獨特的偉大性格。不言而喻，銀幕上的這一形象的使人傾倒的力量就在於史楚金的表演的天才、真摯和感染力。但是當我們進行分析時，首先使我們感到興趣的是演員對形象的態度，他的創作方法和他的表演風格。

通常，大家都認為史楚金在這一工作中的成就，是因為這位偉大的天才擺脫了狹隘的肖像任務和圖解任務，而大膽地面向了創造性地再現伟大形象的複雜課題，並為此動員了自己的全部現實主義技巧。但問題並不僅限於此。史楚金善于感人肺腑地把形象的歷史具體性和人物具體性與普遍的藝術概括結合起來，善于通過伊里奇的性格來發現和表現這種概括。

史楚金所體現的列寧形象是具有人民性的。藝術家創作成就的根本的和主要的意義和總結就在此，他所創造的形象具有這樣長時期的影響的原因也在此。

但这就產生了这样一个問題：藝術中的列寧形象的人民性表現在哪裏呢？要知道，社會主義藝術中人民性的概念和人民性的原則，就其內容來說是非常廣泛的。怎樣把這種概念具體地運用到列寧的形象中去，運用到史楚金所體現的這個形象中去呢？這些問題，據我們看來，無論對我們藝術的發展以及對於研究社會主義美學的有關部分，都有極重大的意義。

人們往往把直接接近於民間創作主題和藝術形式的程度當作衡量專業藝術的人民性的標準之一，在對於蘇聯電影中列寧形象的問題上，這一觀點無論在理論家或創作工作者裡面都有自己的繼承人。

當電影藝術和戲劇開始注意到體現列寧形象時，在許多不

同様式的民間創作中就已经刻划过这个形象，这一重要情况起了它应有的作用。在叙事性的童話、長詩、歌謠里，民間艺术的幻想創造出了象征性的概括形象，在这形象中列宁被賦予了巨大威力的特征，他几乎具有神奇的力量，同时又是善于理解每个普通人的心理并能在任何时刻給人以帮助的亲爱的伊里奇。民間詩歌往往通过受着列宁的支配并帮助着列宁的大自然本身的形象，来证实列宁主义的历史真理。人民就是这样把他們对伊里奇的无限而真实的信任，以古老的长期流传下来的童話故事的形式体现了出来。

在电影中，在創造銀幕上的列宁形象时，曾試图通过各种“拟人化”和比喻的方法，曾試图采用民間傳說的形式。这些尝试都是由于要強調形象的人民性而引起的。但結果总是与艺术家的想法背道而馳。傳說的因素并沒有丰富銀幕的形象，并沒有象我們所期待的那样把它提到史詩的英雄主义的宏伟不朽的高度，恰恰相反，倒是降低了它的气魄，流于温情主义和平庸。这种情况是由于民間史詩和电影艺术两者的现实主义形式不相符合而产生的，因为样式上的混乱必然会破坏艺术的真實。

Ц·Ф·波波夫在电影批评中便持有上述的人民性观点。波波夫在《苏联电影剧作問題》(国立电影出版社，1939年)一书中分析关于列宁的影片时便认为，这些影片的剧作成就只在于情节接近于民間史詩的主题。这里，批评家的方法論上的錯誤，在于他沒有把历史的现实当做真实性的标准，却把民間史詩当做了真实性的标准，而历史現實在民間創作中是以它固有的形式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来的，但在电影艺术中則要从另一方面来加以反映，可是波波夫却认为，电影艺术仿佛是在反

映着民間史詩的主題。我們認為，類似觀點在實踐中只能引向形象的風格化、刻板化，以及對現成形式的欣賞。

在某些作品中所採用的方法，是通過對“千百萬人中的一個人”的命運的公式化的表現、通過對作為群眾的化身的“來自人民中的人”與革命領袖的關係的表現，來“折射地”揭示出列寧形象的人民性。這種折射式的間接的典型化手法，必然會導致公式主義，會不僅僅使人民這個主題而且使列寧的形象變得貧乏無力。這種手法實際上只不過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天才與人民之間的關係這一命題的表面的、圖解性的說明罷了。

雖然現在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對列寧的艺术形象的人民性的這種看法是狹隘片面的，但最近我們在實踐中仍然會碰到這種現象的復發，例如《阿芙樂爾號的炮聲》的劇本和演出，就正是這樣的。

劇作家包哥廷在紀念史楚金的一篇文章里寫到，他在與這位演員共同工作的時期，使他認識到了史楚金天才的內核——人民性。包哥廷寫道：

關於他，應該老老實實直接了當地說，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人民演員。我們常把通俗性與人民性混為一談。由於我們的艺术具有群眾性，所以想要達到“家喻户晓”並不怎麼困難。依我看來，人民性首先是人民内心中所蘊藏著的對最美好事物的感情。^①

我們認為，包哥廷在這裡給人民性作出了很正確的評述，指出了最本质的東西——人民性的概念與美的概念的聯繫。同時，作家在發揮他由於對史楚金創作過程的觀察而產生的思想

^① 包哥廷：《戲劇與生活》論文集，藝術出版社，莫斯科，1953年，第205頁。

时，还指出了史楚金創作的人民性的特质：“我认为，他完全是象普希金那样理解着人民性的，并且像普希金那样热爱着人民的一切。”^① 这是对史楚金最好的說明。他就是这样地热爱着人民的一切，这样地理解和感受人民性的。史楚金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創作中直接摹仿过民間艺术的現成形式和形象表現。但这位演員却把握住了民間史詩所叙述和歌頌的主要东西：人民大众渴望着通过史詩般的列寧形象来理解自己的历史道路的意义。

史楚金所創造的形象的人民性首先在于，这个形象反映出了列寧和人民的历史联系和一致，即伊里奇对人民的爱和对作为历史的自觉創造者的人們的列寧式的信任。史楚金懂得，历史真实性的首要条件，就是要表达那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的領導者的人們性。史楚金所力图体现在銀幕上的正是这种內容，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这位演員的思想艺术意图中，并且从收藏在他的档案中的札記、筆录、書頁边上的批語，从与他共同工作过的导演的回忆，以及从他遺留下来的創造角色的其他材料中，也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演員頑強地探索，发现，然后再根据形象的内心視象，坚持不渝地把他最需要的詞彙和用語一个一个挑选出来，抄写下来，当作自己的探索道路上的路标。

保留在档案中的一張紙上，簡短地写着这样两句话：

相信人民，热爱人民。

另一張紙上写着：

像騎士般为唯一的理想服务。

^① 同上。

在这句话后面，演员写道：

对人民的热烈的爱。对人民的最大的信任。从自觉生活一开始
直到最后一刻，对人民的最深厚的、始终不渝的（忠实？忠诚？）
(方括号内是史楚金所遗漏的字——作者)。

但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信任，对人民的彻底忠诚，还不能(像演员所感觉到的那样)把领袖和群众的这一伟大关系的内容全部包括进去。史楚金继续写道：

· 向自己的同志们，向人民，向生活(学习)。

在史楚金的札记中我们两次读到他的这个有代表性的看法：“向生活学习”。

而最后，在史楚金的第三张纸上(在印有“列宁博物馆”字样的笔记本里)，演员简明扼要地写下了本质上最主要的东西，确定了形象的思想内容：

· 爱人民。

· 面向群众！

· 倾听他们的意见。

· 谈话，聊天，帮助他们分析问题并通过群众来检验自己，同他们交换意见。

· 一切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切为了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巩固胜利。(①)

演员在着手体现形象以前，就这样表达出了自己的思想。

① 史楚金档案，9—466号。

值得注意的是，演员在这里已经把概念变成了动作任务，这就使他能够把列宁与群众与人民的联系具体地表现出来。

史楚金对历史材料所进行的巨大的研究工作，都是为了要了解它的内容。包哥廷在同本文作者交谈时，讲到为了揭示人物史楚金怎样探索形象化的形式的情形。包哥廷说：

一般演员往往向我们作者提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要求，他们说：给我把这场戏写得更容易表演一些。可是史楚金却从来没有找过捷径。有一次，他来到我这里，向我说：“你知道吗，我想起来一个场面。”于是他就像亲眼看到过一样把这个场面讲了出来：这儿是人民委员会里的一个空房间……电话铃响了。没有人走过。有一个人走过，顺便向屋里望了一眼，看到是空的，没有进去就走开了。还有些人走过，听到电话铃在响，往门里望了望，但大家都沒有空儿……电话铃继续响着——耐心地、迫切地、坚持地响着……列宁偶然从旁边走过，也向房间里望了望，听到有电话，就走了进去。是从某个团打来的紧急的电话报告，他细心地全部记录了下来。以后，人们都向他走来……房间里挤满了被列宁的声音吸引来的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把伊里奇紧紧地围起来，每个人都想问他些什么，或者告诉他些什么，都想同他交谈自己认为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都想听他讲话，有的也许只是为了在旁边站一会儿，看看他——仔细地看看他。列宁被人民围在中心。正是在中心，正是被人民围绕着（史楚金坚持要这样的动作设计），而不是在群众之上，也不是在群众旁边……这个场面应当发展成为巨大的人民形象，也就是列宁的形象——人民的喉舌、人民的领袖的形象。

包哥廷继续说道：

史楚金讲完以后又补充说：“我已经感觉到了该怎样来演这一场戏。”我同意了他的看法，写下了这一场戏。史楚金在排演时，出

色地表演了这一場戏……在演出中，史楚金所构思的这一杰出的場面，却只剩下了—个結尾，而且还是从新安排过的。对史楚金和我來說都是非常可貴的那一由小到大的增长和发展過程，却沒有了……

在包哥廷的叙述中我們看到了主要的东西：史楚金的探索方向——从朴素的、生活的具体性出发，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广泛的形象化的概括。崇高的英雄主义思想便包含在革命的現實中，包含在人民的生活中——史楚金对創造不朽的英雄形象的美学見解，主要就是这样的，史楚金对社会主义艺术中英雄的崇高的事物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自然，史楚金所創造的列寧形象的人民性，是由演員的創作方法决定的。

有三个概括的思想像一条紅線似的貫穿在史楚金的筆墨和言論中。演員显然賦予了这些思想以极大的意义。第一个思想是关于列寧对人民的态度；第二个思想是关于人的各种崇高品質在列寧的性格中和他的个性中的結合；第三个思想便在于反对表面的宏伟，在于史楚金的信念和决心完全与剧作家卡普勒、包哥廷和导演罗姆的观点相一致，这就是要表演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而不是通过概括的形式表現抽象的英雄形象。演員显然非常了解包含在艺术形象的內容中的思想概括与体现艺术形象的外部形式的概括性这二者之間的区别。史楚金致力于广泛的概括，但他坚决反对形式的概括性，因为这种概括性在不同的程度上始終是假定性的，并且会放过生动的具体的細节，削弱形象的现实主义。在这方面，史楚金是不屈不撓的。任何人都不能使他离开具体性和真實性——艺术的、生活的、历史的真實性的立場。他深信历史不需要粉飾，他对包哥廷說：“我決不想把自己扮成一座紀念碑！”史楚金在研究第一手的历史材料

时，在电影艺术的范围内继承高尔基的散文、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和安得烈也夫的雕塑所开创的道路时，达到了这样一种美学信念，这就是要在艺术中把列宁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极其质朴而且真实”。

上面提到的史楚金的三个思想，是彼此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演员所达到的成就，研究他在银幕上所创造的形象，我们便可以看出，形象的完整性正是由作为史楚金的处理手法的基础的这些原则所决定的。

史楚金与导演罗姆在最初几次“带原则性的”谈话里曾相互约定：探索所体现的生活的真实，力求再现人物性格的个性特征，力求从揭示伊里奇与普通人民的亲密关系这一主题入手，来理解整个形象。卡普勒的电影剧本材料和包哥廷的舞台剧，使他有可能正是这样地来处理形象。

导演罗姆回忆说，史楚金第一次同他会见时就承认自己确有一种顾虑，恐怕总导演会要求他从外部来描写领袖，因此他一开始认真地声明说，他绝对拒绝使主题染上抽象的英雄主义的色彩。于是导演和演员的观点获得了完全的一致。

史楚金坚决反对舞台艺术中的一切外部的表现、摹拟、“扮演”和“一般的”没有个性的表演。他在这方面，也像在其它各方面一样，是俄罗斯舞台“体验”学派的真正代表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真正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带假定性的宏伟他都认为是极其不正确的，都是与列宁形象的本质相矛盾的。史楚金懂得，如果把列宁的形象塑造成“脚登厚底靴”的人物，那就只能使它脱离人民。他深恐用夸大的“美”歪曲了列宁的形象。

史楚金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在描写伟大人物时反对那种

无生命的宏伟性。史楚金认为程式化的、没有血肉的、“褒奖式的”对领袖的描绘，会使艺术概括趋于僵化，会使形象不能直接影响观众，会闭塞通往观众心灵的直接道路。

馬雅可夫斯基把艺术中对列宁形象的这种解释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唯美主义的”解释，是很有意义的。1924年10月21日馬雅可夫斯基在联共（布）党莫斯科市委会的紅色大厅中向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朗读了自己的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辯論之后，馬雅可夫斯基答复了論敌。馬雅可夫斯基特別指出，他想以整个革命史为背景，来塑造列宁的强有力的形象，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唯美主义的形象……”^①从詩人的这些話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多么了解自己的任务，他是多么了解艺术中的真正的宏伟性。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把政治领袖描写成“官气十足的样子，脚登厚底靴，头頂光輪。”^②

高尔基在他写的有关列宁的回忆录的第一頁上便着重指出：“描写他的肖像是困难的……他是那样质朴坦率，就像他所說的話一样。”^③

我們如此重視这一問題，还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这一問題仍沒有失去它的尖銳性。我們許多現代演員，其中也有一些艺术大师，在电影和戏剧艺术中体现列宁及其他伟大人物形象的美

① 《馬雅可夫斯基的长詩〈列寧〉在党积极分子評論大会上》，1924年10月23日。《莫斯科工人报》。轉引自卡达羅著：《苏联作家》文学年刊中的有关馬雅可夫斯基的一章，1948年，第212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② 《馬恩全集》第8卷，第293頁。

③ 高尔基：《列寧》，《高尔基全集》第17卷，1952年，第4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践，說明他們中間有些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实际是站在相反的立場上的。有許多扮演者不是从活生生的現實出发，而是从追求宏伟性这样一种純理性的願望出发。这就使形象失去了內在的运动，失去了戏剧性，失去了活生生的蓬勃的生活气息，从而也就会使形象与观众隔离起来。

史楚金总是从生活出发，并且在像列寧的主题这样巨大的主题中，也忠实于生活。同时必須特別強調地指出，史楚金也力求表現列寧形象的气魄和伟大，他找到了艺术体现的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宏伟。他的目的正是这样的。但他走的是另外一条更困难，然而又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富有生活具体性和历史真实性的现实主义道路。史楚金想把列寧表現得就像他在历史现实中本来的那样。深刻的现实主义终于使史楚金正确地理解并鲜明地揭示了列寧形象的人民性。

史楚金在关于扮演列寧的原则这个問題上的美学观点，其客观意义便在于反对个人迷信，在于对历史过程的規律性，对人民大众与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正确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解。

史楚金的观点是彻底的历史主义的，这无论在斯大林、高尔基、克魯普斯卡婭对列寧的回忆中，或是在馬雅可夫斯基所写的关于列寧的长詩中，以及在安得烈也夫的繪画和雕像中，都可以找到原則性的論据和证明。

史楚金这位现实主义的演员，在斯大林論列寧的文章中，怀着喜悅的心情看到了伟大人物形象的现实主义的具体的再现。他决心努力再現出现实的、历史具体的、在生活和心理上可信的形象，决心努力体现出活生生的、富有个性的性格，并通过大量的生活細节来揭示性格。他更明确地意识到試图表現